

浙江乡村社会研究丛书

魏 桥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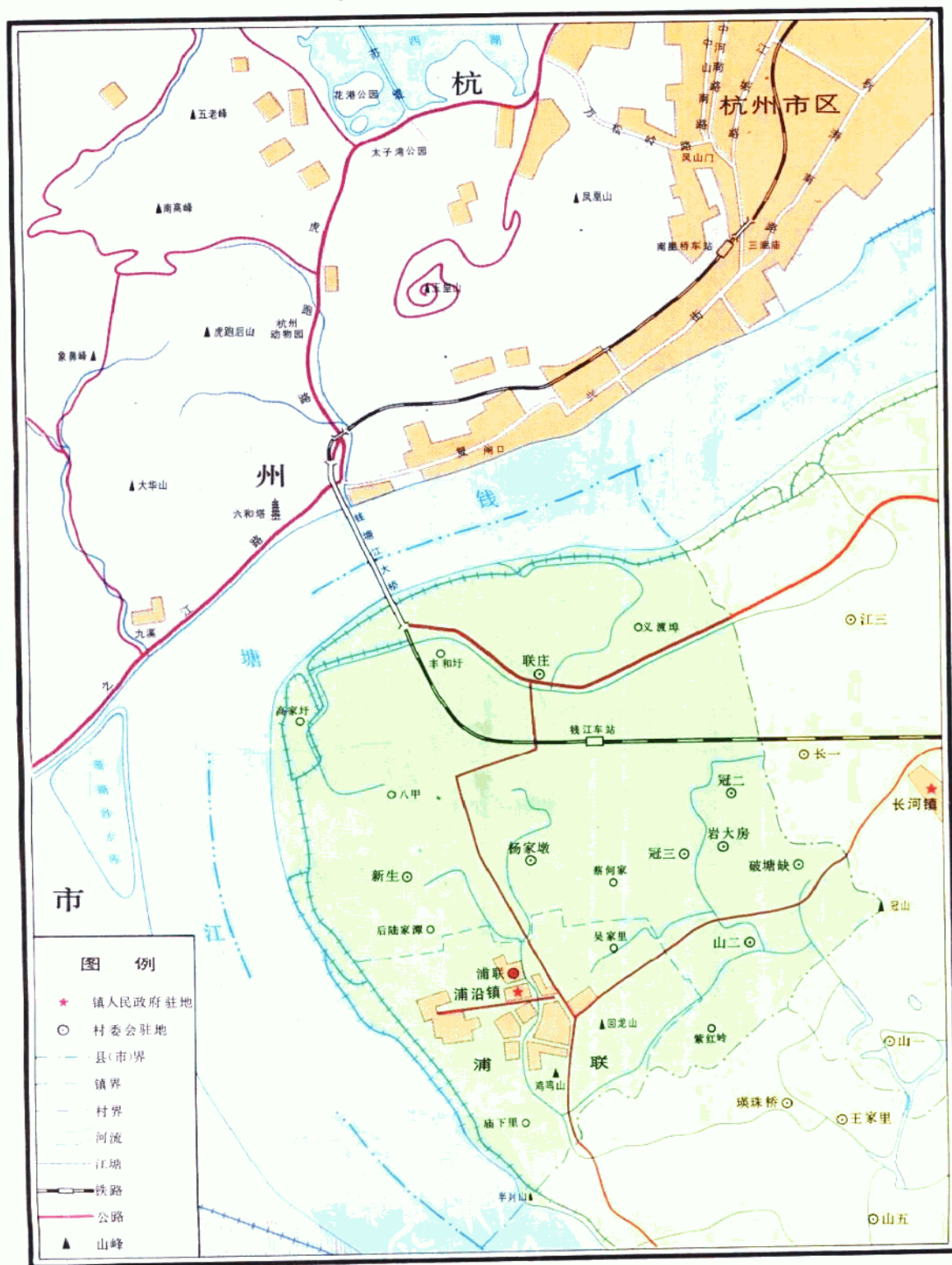
浦联村志

浦联村村民委员会 王志邦 编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浦联村位置图



沧海桑田—钱塘江的造化



春秋越国沿海军事要地鸡鸣墟(鸡鸣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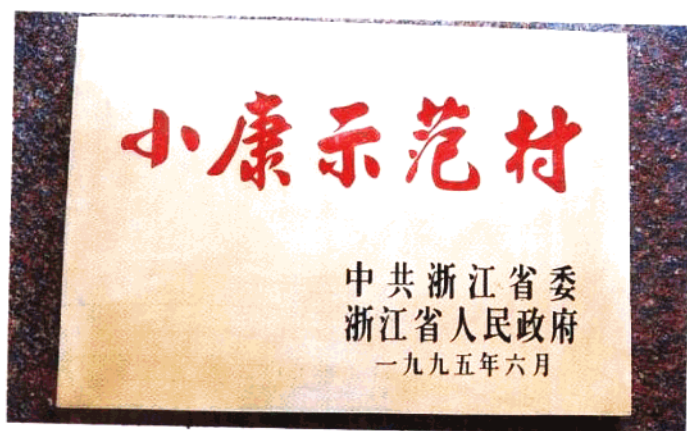
回龙山远眺

浦联的诞生



浦联村党总支活动室





村区鸟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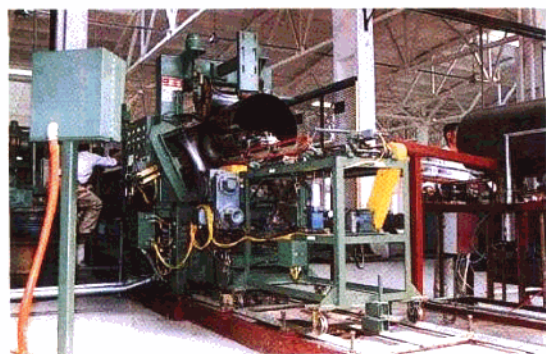
工业化道路



钢丝车（搬运队时期的运输工具）



浦沿运输公司（搬运队）



萧山市油桶制造厂



杭州南郊化学厂



浦沿金属钣金厂



萧山市金刚石拉丝模厂

种植业副业化



机耕



收割



蔬菜



养鸡场



茶园



鱼塘

从传统迈向现代



草舍



传统民居壁画



现代民宅的栋梁已成传统的“活化石”



村民新建住宅



富前路



小学



1987年，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左三）视察村保健站



1995 年换届前村三委会成员合影

前排左起：蒋金木、蒋焕鑫、杨焕泉、朱李兴

后排左起：汤连法、王永献、杨松国、蒋金娥、汤贤勇



1995 年换届后村党总支、村委会成员合影

前排左起：杨松国、蒋金娥、朱李兴

后排左起：汤连法、杨焕泉、蒋素英、汤贤勇

志我盛在怀先
 業創千秋育後人
 萬煥金
 一九九五年二月



银杏



村委会办公楼



浦联村村志评审
 会议会场

总 序

乡村研究是一个不应忽视,又往往容易忽视的项目。

乡村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农业,昔为“王业之根本”,今为国民经济之基础。乡村状况如何,关系到整个历史演变的进程,关系到现实国家总体发展的重大战略。乡村研究要加大力度,刻不容缓。

分散、辽阔、宁静的乡村,维系着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兴亡、时代的进退,于无声处常常会响起醒世的惊雷。

秦末酷刑重赋,20倍于前代的租税,30倍于往昔的力役;贫民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天下苦秦,帝逼民反,结果军起垄亩,导致不可一世的秦王朝迅速覆亡。

汉初实行一系列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因暴政、战乱被迫离开土地的百万农民重返家园,“衣食滋殖”,才使“天下晏然”。

三国鼎立,群雄相持,百姓流亡,恢复社会经济,增强实力,为后来西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贞观之初,灾荒连年,唐太宗除推行均田制外,实行新的租赋徭役制度——租庸调制,轻徭薄赋,使社会安定,风尚纯朴,世称“贞观之治”。

中国漫长的历史风风雨雨,曲曲折折,乱治交替,扑朔迷离,可以举出许多事实,可是道理很简单:谁也不能忽视农村,轻视农业,背离农民!

恩格斯有句名言:“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4页)多么朴实的真理。粮食足,天下安;农民富,国家强;农村稳,百业兴。

建国40余年的历程表明,农村稳定,粮食丰收,带来的是来年工业生产、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相应增长。“大跃进”之年,“左”的干扰,农业生产徘徊不前,于是人的口粮、畜的饲料、副食品供应和工业原料等项项紧张,处处紧张,全面紧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决定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业和农村突破,终于春江水暖,山花烂漫,实现了历史大转折。

到本世纪末,全国人民生活要达到小康水平,重点在农村,难点还是在农村。农村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大力发展农业,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值得深入探索,认真研究。

研究工作要有人,要有队伍。十余年的地方志工作,在完成市县志书的同时,已经形成了一支不小的修志队伍。有专职的,也有兼职的。其中许多同志长期从事文字工作、基层工作,有较高的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业精于勤,在修志中又逐步成为行家里手,并以扎实的成果获得中、高级技术职称。如今,他们在完成市、县志书的编纂出版之后,共同把兴趣放到广大农村,把目光注视到农村的历史和现状,着手进行深入研究。相信“有心栽花花必发”,辛勤的耕耘,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

浙江地灵人杰。乡村研究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有的需要单科独进,更多的需要进行综合研究。我们主张一切研究都只能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从积累翔实、可靠的历史和现实资料入手。言求有据,不尚空谈,少发空论。为此,这套丛书将以完整、系统的资料见长,提供给各方人士参考、研究、应用、交流。

几年前,我曾受浙江人民出版社之托,主编过一套《浙江文化丛书》,先后出版过7种。这套《浙江乡村社会研究丛书》,能出多少一时尚难完全确定。这两套丛书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浙江的今和古,两者可以相互补充,相辅相成。

研究问题,编写书稿,不能简单地分配任务,单纯任务观点是做不好研究工作的。也不能急于求成,靠几个晚上一蹴而就,拿出成果来。只有立志于斯,目光敏锐,埋头苦干,并积以时日,才能取得若干成效,我们将为此而共同努力。

魏 桥

1993年8月

序 一

近年来,浙江省各地的农村陆续出版了一些村志:先前已有江山市的《白沙村志》、萧山市的《尖山下村志》、象山县的《伊家村志》;去年又有永康市的《河头村志》、慈溪市的《湾底村志》。上述已经出版的村志还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村志正在编撰和筹措编撰之中,不久可望陆续面世。去年底,我曾应邀参加了萧山市的《浦联村志》稿的审定会议,作者王志邦副研究员希望我为该书写一篇序。我愉快地接受了委托,觉得自己有责任向读者和学术界介绍这部书的特点和价值,同时也想借此机会对村志编纂的主要问题再贡献一些不成熟的建议。

我国现在大约有 70 多万个像浦联、河头、白沙这样的行政村。它们遍布祖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既是历史上也是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基层组织结构。在这里世世代代生活着中国社会的主体——农民。要了解中国社会及其主体的农民,对这种基本的组织结构缺乏深刻的了解显然是不行的。个中道理现在已越来越为较多的人所认识。然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迄今似乎仍未引起大家应有的重视:说到了解中国社会,如果作为其构成主体的中国农民他们自己没有这种了解的需求,或者虽有这种需求却没有为他们的了解提供适当的读物,慢说我们的学术界是否能够对中国社会获得真知灼见,即使学者们通过潜心研究已经获得了很正确、很有深度的认识,这种书斋里的东西充其量也只能是在少数精英中传播的思想,或者甚至无非是一些连同行专家也未必有兴趣的观点。从学术的继承看,没有这种经院式的纯学术研究当然不成;但是,从学术的创新和应用看,无疑更需要那种记载广大农民、并且是他们有兴趣读和读得懂的研究成果。因为如果没有这种适应广大民众的读物,提高国民素质就无从谈起;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学术的发展既失去了社会的需要,同时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客观条件。目前正在兴起的村志,尽管其考察对象范围很小、层次很低,著述的水平参差不齐,往往显得较为稚嫩,但它的主要特点和意义恰好就在于这是一种以农民为研究对象,又有农民直接参与编撰、并且是以农民为主要读者的新型著作,非常值得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对于中国历史学而言,我以为村志的兴起很可能将为摆脱目前正严重困扰着中国史学的危机注入一股动力。

就我所接触到的村志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本村的农民在专

业工作者的指导下自己动手来编撰的村志,另一类是本村的农民和专业工作者结合,由专业工作者编撰的村志。关于前一类村志的价值,我曾以《〈河头村志〉:当代中国农民的心态和史学》为题写过一篇文章,在去年召开的“传统与变迁:中国农民的社会心理”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介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兹不赘述。《浦联村志》堪称后一类村志的代表,这里拟从它与前一类村志的主要区别入手加以评估。

翻开《浦联村志》,读者一定会为它的巨大篇幅和丰富内涵而称奇。全书以村域、村民、村区组织、土地、基础设施建设、种植业、养殖业和林业、企业、农业集体化时期社会分配、村办企业时期社会分配、村民生活、村民观念等项目分编,每编又各以不同的子目分章,章下立节,节下或根据需要再设小目。统计全书,凡13编、57章、168节,80余万言。此外,书中还有各种统计表格566张,把所述的各种事实和过程都化为可以直接计量和相互比较的数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这样宏大的篇幅、以这样广阔的视觉维度记述一个村历史和现状的村志在我国还是第一部。

史学著述必须以资料的收集、鉴别和综合为第一要务。大体说来,这项工作的难易总是与它所记述人物的地位高低、事件范围的大小成正比。大凡涉及的人和事层次越高和范围越大,资料就越具神秘性和歧义性,收集整理艰难,去伪存真更难。要是想对其中一些关键问题进行客观的讨论,特别是有所批评,则在在都有难以言状的困难险阻。反之,要是研究者肯把视线转移到社会基层及其主人农民大众,所有这一切困难便基本上不复存在。有关资料极其丰富而易得;只要勤于调查、勘比,资料的核实亦非难事。例如,像浦联村就保存着自建国以来,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来系统的档案资料;作者王志邦又取得了村党总支和村委会的大力支持,熟悉本村情况的村民蒋厚发和虞成根等自始至终地积极参与了资料的调查、收集和核实工作。如果与做其他社会层次的历史研究相比,编写村志显然具有相当优越的客观条件。然而,为什么专业史学工作者一般都热衷于比较难于开展的上层社会历史研究,而对客观研究条件较为优越的下层社会历史则往往总是不屑一顾呢?我以为,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出在史家的史观上,亦即我们中的多数人不管口头上怎样宣言,目前其实仍旧并不真正认识这些中国社会基层组织及其主人——普通农民所具有的历史价值。本来,有关他们的历史资料理应极其丰富,正是由于过去史家大抵只重视社会上层而极其轻视下层普通群众的历史之故,有关的资料在漫长的岁月里被视同敝屣,任其自生自灭,到如今几乎已流失殆尽,以致在我们这个长期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里,迄今有关农村和农民历史的研究既缺乏必要的文献积累,又缺乏可资借鉴的学术传统。《浦联村志》的作者在史学界仍然把名人名家

和上层社会发生的事件放在视线的焦点之际,恰恰选择了历来被忽视、一直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一个村落为对象,并与当地农民联手,在收集了大量的档案和采访了许多口碑资料的基础上,认真排比,精心鉴别,使这个村落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几十年的历史变化得以从地貌景观、人口构成、村区的组织和产业结构、村民的分配和生活、村民的风俗和观念等多种层面完整地再现。这样写作史学著作无疑需要独具匠心的史识,而写出这样的史学著作无疑又将为正在兴起的史学分支——村志学提供有益的经验。

行政村的空间一般都很小,像这样微观的对象特别有利于作宏观考察。同时编撰村志也只有宏观上把握了该村之后才有可能驾驭千头万绪的琐细小事,从中选择典型的事实给予叙述,收到见微知著之目的。然而,从已经出版的村志看,目前这还是一个难得恰当处理的问题,其中村志架构与内容之间的脱节就是比较常见的缺陷。目前,一般的历史著作都抛弃了我国传统史学的体例,采用线性思维,把客观历史进程孤立起来进行研究,其优点是学科分支越来越细,考察越来越深,从而使史学及其各个分支越来越专门化;与此同时,其不可避免的缺点是本来完整的历史过程因不断的分割产生了细碎化,容易导致以偏概全,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村志与现今一般的历史著作不同,采用了地方志那种纵观古今、囊括天文、地理和人事的宏观架构,这显然是很明智的。问题在于它所记述的内容往往多千篇一律的套话,少由表及里的深刻揭示。这表明村志的编撰尚未找到衔接宏观架构与具体内容之间的桥梁。《浦联村志》在继承我国地方志的宏观架构同时,大量吸取了历史地理学、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种新兴学科的成果,力图使记事的丰富性和认识上的深刻性有机地融为一体,为恰当地处理村志研究中宏观和微观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有意义的尝试。

浦联村地处钱塘江南岸,在著名的钱江大桥西侧,隔江可与六和塔相望。钱塘江出海段的江道自宋以来经历了一个由南向北、最终在清朝乾隆二十四年(1759)改从北大门入海的迁移过程,与此相适应,南岸江涂则不断向外伸展。《浦联村志》以村域开篇,首先把这种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与该村的各个聚落由南向北的逐步开拓过程联系起来,既记录了村貌景观的变化,又给出了造成村域聚落不断向北扩展的客观动因。接着,该志对村民的考察视角更加广阔,包括了姓氏、村民的数量和素质、劳动力的数量和结构、家庭及其规模等多种层面。从姓氏方面看,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虞芽一家由义乌县五都华溪里迁居此地建立楼下虞,后来又相继有王、蒋、汤、周、吴、韩等姓迁入,兴起了王家里、蒋家里、汤家里、周家里、吴家里、庙下里、华家庄等聚落。1995年3月底调查,全村有101个姓氏,共计1785户,5161人。不过,在这101个姓氏中,

百人以上姓氏只有 13 个,而他们却要占全行政村人口的 80.34%。这也就是说,从过去的江涂的开发到近年来的工业化,尽管这个村的人口有了很大的增长,千年来那种以一姓为主形成一个聚落的分布状态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村民的就业和家庭方面看,历来以务农为生的浦联人在近 20 年中却发生了真可称得上天翻地覆的变化:到 90 年代,劳动力全部务农的家庭占全村总户数的比例已很小,1991~1992 年抽样调查的 20 户中没有 1 户劳动力全部务农;传统的三代同堂那样的直系家庭也已基本上被一家三口的核心家庭所取代。上述两个方面的事实表明,这个村的村民在既没有离土也没有离乡的情况下迅速地实现了从第一产业全面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巨大变化,而这里既没有出现大批农民的离乡进城,也没有招来大批外地农民进厂做工的现象。自然,作者编撰村志的本意主要在于记录事实,并不是为着简单地提出、亦非为着简单地解释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由于每一编的内涵所具有的多角度和客观的性质,阅读各编时处处都可以引发许多问题,同时也为解释这些问题提供可靠的线索和资料。我在读完这部志稿之后最感兴趣和最有收获的就是浦联这个千年来的传统农村在近年中迅速实现了工业化的道路问题。

浦联人历来主要以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为生。新中国建立后不久,这里除了像其他地区的农村一样先后实行了土地改革、集体化和公社化等变革之外,还一度受国家计划的支配,变成以经济作物(1965 年以前是棉花和络麻,以后是络麻)为主的种植区,村民的农业身份又多了一层行政的限制。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稀缺早已是这个农村的基本地情。50 年代初进行土地改革时,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贫雇农的标准就只有每人 0.9 亩耕地(富农和中农每人保留 1.2 亩,多余的土地被没收或征收),此后更迅速递减,迄止 1994 年已降至 0.3 亩左右。这也就是说,浦联的人均耕地在建国以来呈现为一条不断下降的趋势线。如果从总产值和人均收入方面看,浦联的发展趋势则表现为一条升降变化很大的曲线。大体说来,在 1961 年以前,无论是作物的产量还是产值,也无论是全村还是人均的收入,每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例如,1957 年村总收入为 28 万元,到 1961 年增加为 74 万元,同期人均收入由 61 元增加为 172 元,上升率为 281%;自 1962 年至 1968 年间,村总收入即使不计物价上升因素也始终低于 1961 年,至于村民的个人收入的下降幅度更大,当时最高年份的人均收入为 119 元,最低年份只有 73 元,下降率在 38~58%之间;而从 1969 年以后迄今的 20 多年间,如果不计农作物的产量,全村的总收入和村民的人均收入逐年出现越来越大的提高。前者由该年的 77 万元上升到 1994 年的 1.3 亿元,后者由 117 元上升到 3326 元,上升率为 2843%。建国以来浦联村的总收入和人均收入所发生的这种升降起伏对于村民无疑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这里浓